

『歐化』」的結論。

《清代廣州的巴斯商人》是郭德焱先生十多年來奮力潛研，堅持不懈的研究成果。筆者認為，本書在一些方面還可繼續深入探究，比如除了巴斯商人與英國人的關係外，巴斯商人與其他各國商人的關係也可進一步探討。以美國商人為例，美國人也參與了鴉片和港腳貿易，雖然所佔分額與巴斯商人不可同日而語，但美國人和巴斯商人在印度和中國的貿易中的聯繫在所難免。由於美國南北戰爭，英國和美國對棉花的需求大量增加，再加上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大大縮短了航路，使巴斯商人轉向了印度洋和大西洋上的棉花貿易，慢慢退出了中國市場。那麼退出中國市場後的巴斯商人與英國人和美國人的關係又如何呢？

另外，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巴斯商人雖然逐漸從廣州撤退到香港、澳門等地，而到上海的巴斯商人逐年增加。到了1859年，在上海的巴斯洋行竟達到14家之多，而且在不同時期都有白頭禮拜堂（見圖版十八1866年、1899年和1932年的上海白頭禮拜堂圖版）。因此上海的巴斯商人也是一個值得繼續探究的問題。我們相信，隨着資料的挖掘與學術眼界的不斷拓寬，作者對此課題的研究還會不斷深入和拓展下去。

周文娟 蔡香玉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 By Leo. K. Shin. 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xxi, 227pp.**

1954年Herold J. Wiens基於華南乃至東南亞國家成爲戰略要地，備受世界列強關注，因此撰寫《中國向熱帶地區前進》（*China's March Toward the Tropics*），認爲漢人移民的經濟需求、政治利益以及統治、文化階層爲了文明化動機，展開一連串殖民化過程，終導致當地土著滅絕。五十年後，單國鉞（Shin, Leo Kwok-yueh）重新檢視包括Herold J. Wiens等學者的相關研究，指出傳統看法有：（1）主張對抗者，總是強調漢移民與土著群體之間緊張關係，由此衍生的觀點是開墾被視作併吞，而移民多次爲了爭奪資源，經常央求國家協助；（2）主張同化者，重視漢移民如何轉變土著；（3）採調和論者，並非強調移民與土著兩者的緊張關係，而是雙方均曾試圖建立當地的新

秩序；（4）主張中國擴張本質論者，認為國家爲了將政治等力量延伸至邊陲真空地帶，必須擁護當地原有的土著制度；（5）主張交融論者，樂觀地論述彼此是相互影響，藉着「漢族」與「非漢族」最終會結合成統一民族，來說明中國擴張已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單國鉞整合以上討論後，指出這些解釋多半帶有「中國」與「非中國」或「漢族」與「非漢族」的二元論述，他認為要用歷史脈絡理解各族群組成、類別與特定時空下的內涵轉變，方能跳脫二元論述的限制框架，才可理解伴隨中國歷史發展的新課題（頁4-5），於是完成了《中國國家之形成：明代邊境族群及其擴展》一書。

本書作者單國鉞，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目前執教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他在撰寫畢業論文期間曾至廣西進行調查，到過臺北、京都等地蒐集文獻，《中國國家之形成》即是架構在博士論文基礎上的成果，是一本近年少見以明代邊疆與地方族群作爲討論對象的專著。

是書共分六章，在首章〈邊境史〉即開宗明義指出，中國南疆形成雖可遠溯至秦漢時期，隨後又曾實施羈縻等政策，但研究明代理由有二：其一爲我們所認定的中國南疆，是由明代的經驗所形塑，當地族群在特意地被區隔與分類之下，而突顯成政治與文化上的標誌；其二，因爲明代是漢人所建立的王朝，由此更能突顯與其他征服王朝政治主張異同的比較（頁8-10）。關注廣西也有兩項理由：其一是廣西早自秦始皇大一統帝國建立時就爲中央所統治，並非如雲貴地區長期爲化外之地，也因此國家會格外地注意控制；其二在於廣西的自然地理條件，透過西江流域、靈渠之間的航運交通，能夠運輸人員、物資與部署軍隊，使國家得以獲取廣西物產，若與雲貴地區相比較，廣西反倒有更多的調查建設與文化保存（頁10-11）。

第二章〈邊界的性質〉，主要是概述明代廣西的地理環境、行政建置、人口及其生活情況。作者以明成化年間李宗羨至廣西潯州府任官後的悲慘遭遇，說明廣西環境之險惡。雖然「桂林山水甲天下」傳頌一時，可是明代旅人從中土來到邊境，感覺就像來到文明盡頭，身處充滿危險與挑戰的異域（頁20-21）。爲了能控制地方，明朝在廣西同樣增設各級地方行政機構，並派遣督撫大員統籌軍政事務。設置了王府、皇莊，作爲皇權延伸的象徵，不過王府往往是國家財政的主要負擔，亦成爲南方邊境麻煩的來源。此外明朝在廣西擴展多項公共建設，如開鑿水渠、鋪修官路等等，然而當地仍存不少威脅，讓官員與旅者視爲畏途。爲了延伸軍事力量，明代在廣西實施軍事衛所制度，實行軍屯政策，但軍隊人數陸續下滑，屯田畝數大幅消失。原因有二：一、戰爭規模與南方疆域的環境，導致倖存的軍人銳減；二、軍戶大

量逃亡，甚者淪為佃農（頁37）。所以必須清軍或是從他省補充軍隊，不時補充民兵、民壯與募兵，要求民間組織保甲，治安上更依賴土兵所組織的耕兵，到了十六世紀末募兵人數已經超過衛所與民壯人數的總和。在官方紀錄中，明代廣西人口持續減少，只是官方人口統計數字難以令人信服。目前廣西非漢族人口約佔百分之四十，或可據此推估當時非漢族人口應該高達百分之六十以上（頁43-44）。作者認為，當國家延伸控制力量和移民人口擴張時，隨之轉變了南疆的生態環境，如侵犯老虎與象群的棲息地，同時明朝人也意識到在邊境發展有其侷限。

為何明代會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對此第三章〈土司政治〉做出了解釋，受到明太祖祖訓以及明初飽受北方蒙古的威脅，於是官方傾向將南疆交由當地首領治理。況且明朝在南疆力有未逮，考量迫切教化與邊疆管理將付出極高代價的情況下，不得不給地方土酋予官員頭銜與特權，以換取其順服。土官有權利也有義務，每三年需上朝一貢，這種土貢制度代價雖高，卻對雙方都有利，朝廷可藉此宣示主權，土官則獲得財政收入與地方統治的合法性。明代除了要求土官朝貢外，更需要土兵協助軍事平亂，如對抗安南與派往東南沿海征討叛亂。作者並介紹了廣西各級土司機構與運作情況，闡述土流官員共處，產生地方行政紊亂的局面；過度依賴土兵，反導致動亂延續；中央要求土官順服受教，成效卻有限。以思明府的土官黃氏家族為例，國家與土著首領的結盟相當脆弱，土官之間存在固有的緊張關係（頁75-81）。又以田州岑氏家族發展，說明國家與土官結盟的破裂還在於土著首領也在尋求擴張自身力量（頁81-90）。關於土官存續或廢止問題，明代曾多次討論，不過即使如此，土官制度卻難被取代，仍然被保留延續。

接着第四章〈聚落的繪製〉，就明初懷遠縣的設置始末，指出明初對於「蠻夷」開化有過於樂觀的期待，不久懷遠縣就面臨周遭「蠻夷」的襲擊，直到萬曆年間平定徭亂、遷移縣治，懷遠縣才恢復平靜的表象。當時有許多人就認為廣西城鎮被「蠻夷」所包圍，「蠻夷」躲避繇役、打家劫舍，造成居民損失慘重（頁106-108）。官方也感到納稅的戶口嚴重流失，格外關注這些地區哪些人服從繇役，哪些居民是較有秩序，以及又是哪些地方特別容易叛亂。明代南方邊土仍是暴力之地，雖然官方推估可能是不肖官吏、投機惡棍與不法之徒等因素造成，但大多數人還是以為多半與「蠻夷」暴力習性有關。明朝官員持續地將「民」和「蠻夷」區別當作一個基本原則，只是登記的民戶還是與「蠻夷」混雜居住，也導致土地所有關係、稅收徵集都產生困境，某些地區還出現「散則為民，驅之為盜」的情形，紛爭更多是圍繞着

經濟生活、土地資源等爭奪引起的問題。其中大藤峽瑤亂引發明朝高度的重視與討論，派遣軍隊鎮壓與善後措施的開展，都留下不少紀錄，加深明朝人對廣西暴力的認知（頁117-122）。同樣古田地區也存在「蠻夷」的動亂，特別是僮族和當地居民土地關係的摩擦，古田縣幾乎快成為僮族的領地（頁122-125）。最有意思的是隨着平亂，明代官員針對地方所能控制的程度，開始對僮族做善與惡的區分，重新劃分地方行政區域，善者、惡者分置於不同政區。國家力量的延伸也展現在「民」與「蠻」的區別，官員開始區別哪些人納稅與服差役，並加強區分誰是臣民誰是叛亂者，直到明末，類似的區分不僅在文獻紀錄上，亦顯著地在圖象上完成表述。例如透過《蒼梧總督軍門志》、《殿粵要纂》以及《廣西通志》內附之全州、岑溪縣地圖等，可以發現越到後期，「蠻夷」之間聚落的圖象愈能清楚分辨（頁131-134插圖）。最後以1576年新設置的昭平縣為例，讓讀者理解官方怎樣透過新設政區安排，重新安置土著首領與士兵，以加強維持地方和平。

第五章〈區隔的文化〉，以景泰年間首任兩廣總督王翱的奏議，指出王翱將瑤人分成生與熟的概念非常重要，即使類似概念早自前朝已有採行，但此時對南方地區的人們區隔與分類，是爲了提醒更多官員注意這些「蠻夷」。作者並進一步觀察明代典籍中對「蠻夷」的描述，發現往後其分類逐漸增多，描述更爲精確，此趨勢歷明清兩代而一脈相承（頁142表5.1，也參見原書頁191表6.1）。作者認爲明人會進行如此的分類，是隨着邊境政治與文化變遷的理解而來。例如北方土木堡事變後，明代的疆域政策轉爲內縮，對華北邊境主張華夷之辨，面對南方「蠻夷」威脅，亦強調中國與非中國人之間的區劃。一方面官員們隨着邊境經濟與文化的變遷，加強區別的分類認知。另一方面隨着明代社會商業化、流動加速、旅遊風氣提升與學術發展，有更多人來到廣西而留下一些觀察紀錄，這些精英階層建構了一個文化地景的分類描述，展示一種直到現在仍存的「族群景觀」。

末章〈歷史上的邊境〉，主要分析自明代以後，統治者對邊境人口辨識與分類的實踐過程，是持續地在進行着。對清代統治者而言，最要緊在於境內人口的歸順，因爲清代擁有空前的疆土，非得採聯盟方式統治。清朝對南疆曾採取兩種態度，其一是想取代明代政策，採改土歸流；另一個爲實行教化的努力，廣設學校。可是兩樣都有限制。同時，清朝皇帝有自覺地與明代相比，視自己爲天下帝國之統治者，更關注邊境問題，於是《皇清職貢圖》與廣西志書對邊境族群出現更多的分類。到了民國階段，開始關心如何建造一個現代民族國家，提倡五族共和，最終期待「非漢人」被同化或開化。在

中共治理下，曾提出過民族自決的口號，隨之則宣稱是統一的民族國家，大規模進行民族調查，正式承認有五十六個少數民族，設置自治區，原本同化或開化的表述則被現代化所取代。亦即從明清以降，對邊境人口的辨識與分類，其實是緊緊聯繫於國家爲了強化控制的需要。

本書各章節安排明確合理，又可相互呼應，說明上力求簡潔清楚，讀者在閱讀上應不至於產生混淆難以理解之處。本書優點在於整合西方學界流行的研究趨勢，特別是近年來西方漢學界頗熱衷於清代以降統治策略與邊疆族群問題的討論，尤其着重在解構身份認同的轉變（亦可參考張瑞威的研究討論，〈誰是滿洲人？——西方近年滿洲史研究述評〉，《歷史人類學學刊》，第4卷第1期〔2006〕，頁93-112。）。顯然作者要以明代的實證研究來和其他研究者作對話。對於學界重視近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建構問題，作者則強調族群結構的根源其實是在明代產生，在明代亦曾實踐一個政治與文化邊界，補足相關研究上的空白。再者，地方研究之所以可能，在於史料上提供充份的解釋。以廣西而言，地方史志、田野調查已陸續整理出版，確實能給予研究者莫大的方便，也因此作者能大量利用《明實錄》、志書、職官政書、紀事編年史料、石刻碑銘、明人文集與筆記等相關記載進行精采討論。

不過就華夏國家空間實踐上，雖然作者主張明代經驗的重要性，但若站在不同時期的立場觀察，可以發現相關解釋卻大致相同（參見王健文，〈帝國秩序與族群想象——帝制中國初期的華夏意識〉，《新史學》，第16卷第4期〔2005〕，頁195-220。）。如同作者自己也表示：「從很多方面來看，本書所敘述的故事並非明代特有，而是中國歷史的宏觀敘述之一部份。」（頁7）可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明代南疆歷史發展還有哪些特別經驗？諸如明代在廣西的地方行政建制、軍事手段與財政改革，都有值得再深入分析之處。此外，邊境擴展與國家建構確實有密不可分的複雜關係，然而除了觀察國家內部與地區外，恐怕還有必要將視角放在國家週邊地區的互動關係上。畢竟明朝與安南的關係數次陷入困境，明人也曾爲安南問題爭論不已，安南問題的解決與否，當然會影響到疆界上的變動。我相信作者曾考慮過明代的中越關係，也許是因爲，有感於課題龐大或另有他故，而在撰寫上做出了取捨。（關於明代的中越問題，可參見鄭永常，《征戰與棄守——明代中越關係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1998）我也深信，這本以明代廣西作爲場域的歷史研究，將會受到熱烈的注目。

唐立宗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